



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

外国文学

下册

陈应祥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 国 文 学

(下 册)

陈应祥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34570

(京)112号

外国文学

(下册)

陈应祥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0 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1 171—15 704

ISBN7-04-003287-2/I·59

定价 3.90 元

目 录

第十章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1
第一节 概述	1
第二节 列夫·托尔斯泰	23
第三节 契诃夫的《套中人》	44
第十一章 苏联文学	55
第一节 概述	55
第二节 高尔基	61
第三节 肖洛霍夫	85
第四节 艾特玛托夫的《永别了，古利萨雷！》	112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	122
第一节 概述	122
第二节 卡夫卡的《变形记》	140
第三节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148
第四节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155
第五节 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	165
第六节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73

下编 东方文学

绪论	183
第一章 上古文学	188
第一节 概述	188
第二节 印度史诗	199
第三节 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	215
第二章 中古文学	223
第一节 概述	223
第二节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231
第三节 《一千零一夜》	243

第三章 近代文学	253
第一节 概述	253
第二节 泰戈尔	263
第三节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291
第四章 现代文学	304
第一节 概述	304
第二节 小林多喜二的《为党工作》	319
第三节 马哈福兹的《小偷与狗》	329

第十章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学习提示〕 19世纪俄国文学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名作家辈出，名著琳琅满目，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继取得主流地位。学习本节，要注意俄国文学与俄国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着重掌握各阶段重要作家代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独创性和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世纪俄国社会由封建农奴制向半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转化，旨在推翻农奴制的俄国解放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展开的。它经历了贵族革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和酝酿无产阶级革命三个伟大阶段。在文学史上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不过文学史的分期，由于文学本身的特点，不可能与历史上的分期等同一致。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40年代以前为初期；40至60年代为中期；70年代及以后为晚期。

一、19世纪初期文学

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12月的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它们拉开了俄国解放运动的序幕。前者胜利，使俄国人民增强了民族自豪感，看到了自己能够决定祖国命运的力量；后者失败，但圣伊萨广场密集的枪声唤醒了俄国整整一代人。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流派众多，消长不一。古典主义已经过时；感伤主义只是昙花一现，转瞬消失；浪漫主义跃居主流地位，取

得突出成就；现实主义有了很大发展，到 40 年代完全成熟，取代了浪漫主义的地位。

19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继古典主义而起的是感伤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曾一时热衷于感伤主义诗歌的创作，但很快转到了消极浪漫主义。而普希金则从积极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在短短一生中给人类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学遗产。他在诗歌、戏剧、小说诸种文体上都有惊人的成就。其代表作品是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0)。别林斯基指出：“衡量这一部作品，意味着衡量诗人的全部创作活动。”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不象拜伦《唐璜》中的唐璜那样是个穿线人物。奥涅金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知识分子典型。他生活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九年。当时，俄国进步人士已看到欧洲资产阶级先进国家与落后的农奴制俄国之间形成的对比。他们研究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热烈诵读孟德斯鸠、卢梭和其他进步作家的文章，提高了自己的觉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俄国农民、工人的起义和军队暴动，加强了他们改革农奴制的决心。奥涅金受这一时代思潮的裹挟，也开始觉醒了。

奥涅金是个具有多层面性格的人物。从发展趋势看，他虽然不是一个很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①。

奥涅金小时候受法国教师的教育，长大成人后，法语已十分纯熟，且是个有口皆碑的“饱学”之士。他能谈古罗马讽刺诗人玉外纳揭露罗马帝国暴政的诗章，背上几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伊尼特》中的诗句；他指责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忒俄克里斯托，站

^① 普希金在写奥涅金的进步性方面时，多用隐晦曲折手法，有时成节地使用虚点，以便对付统治机构的审查。要努力发掘它们的“潜台词”。

在“今派”的革新立场；他读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它的最大功绩是论述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他对经济学素有研究，这方面他的论断相当深刻。他懂得怎样使国家富强，懂得国家靠什么生存，知道从土地上取得纯收益后，它为什么就不需要黄金”；他厌恶那些充斥着欺骗、呓语、无聊话、陈腔滥调和不讲良心的书籍，“用送殡的黑绸子盖上书架”；他摆脱了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摈弃了世俗的浮华，“蔑视旧习，一向挥金如土”；他在他伯父的领地上，“用轻微的地租，替代了世代的徭役重轭”，创建了一种新的制度，这制度实质上是在局部范围内废除农奴制的勇敢尝试，农奴们欢呼叫好，地主们“都一致公认，他是个最最危险的怪人”；“他确实能看透世人”，但“比别人较为宽容”，含笑听着连斯基“相信世上美满”^①的胡话，“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冷言冷语到了嘴边又强忍”，可见他接受了启蒙主义早期领袖伏尔泰批判邦葛罗斯哲学的正确观点；他与连斯基之间总是发生争执，许多问题引起他们的思索与评判。例如关于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此书探讨个人获得政治自由的途径，强调人民有权推翻蹂躏人权的专制政体，建立以“最聪明的少数人”为领导、体现公民“共同意志”的“理性王国”，书中的这些思想积极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关于科学研究成果，关于善与恶以及自古以来的种种偏见，种种宿命的秘密，特别是关于“生活和命运”的思索与评判（“生活和命运”是讳莫如深的笼统提法，在普希金的初稿里，本是“沙皇的命运”）。然而所有这些问题，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尼金》中都只是提到而没有说明具体看法。不过，从奥涅金此前的思想、政治倾向可以看出，他决不会是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支持者。当达吉雅娜怀着思念之情走进他住过的书房，所看到的是拜伦的肖像、拿破仑的铸像、案上的拜伦诗作以及两三本反映了它们时代的小说。从奥涅金用尖指甲划下的标记上可以看出是“哪些篇章”、“哪些见解

① 邦葛罗斯的糊涂哲学，有利于反动统治。

和思想”使得他震动、共鸣。不言而喻，崇敬拜伦、拿破仑的奥涅金，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

普希金在这部诗体小说中，多次把奥涅金比喻成哈罗德，或者叫“披着哈罗德式斗篷的莫斯科人”。的确，奥涅金和哈罗德有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现实强烈不满，但没有由此走向革命，引起的却是消极的失望情绪。他们既不愿意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积极地与人民一起从事斗争，在生活中总是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就是他们消沉、忧郁、悲观的主要原因。然而，奥涅金不是哈罗德的翻版，他有他的民族生活内容，他得的是“俄国人的忧郁病”。

奥涅金的忧郁病，除去其他原因外，爱情上的经历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美人儿”“屡次变心”，“实在”使他“懊丧”，以致后来无论“上流社会任性的女士”还是“标致的妙龄少女”，他都一概抛弃；“什么也不能打动他的心，什么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对达吉雅娜这样表白：“幻想和岁月都一去不复返，我的灵魂也不能获得新生……”。因此，他冷漠地但也是高尚地拒绝了达吉雅娜的爱情。

赫尔岑在评论奥涅金时精辟地指出：“他什么事情都开始做过，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底；他想得多，做得却少，在20岁上就已经是个老人，可是到得老年时他却因爱情而年轻起来了。好象我们大家一样，他老是在盼望什么事情，因为一个人还不至于这样无知，以为俄国的现状能够长期保存下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生命却消逝了。奥涅金的形象是这样富于民族性，在一切凡是在俄国多少得到认可的长篇小说和长诗中都可以见到，这不是因为他们想抄袭它，而是因为你经常可以在自己身边或者在自己本身找到他。”同时，赫尔岑还指出：“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①。“多余”这个概念后来被普遍使用。

① 两段引文均见《赫尔岑论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63—64页。

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纯洁质朴，感情真挚，与俄罗斯民族传统和俄罗斯大自然有最深刻的联系，而且接近人民。但是，她违背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公爵，不能不说她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

《叶甫盖尼·奥涅金》通过人物活动和作者的抒情插话，广泛地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图景，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品”。

这部诗体小说，全用14行体“奥涅金诗节”^①组成，分8章，每章节数不等。普希金作为抒情主人公进入作品，是作品的有机构成形象。他把奥涅金称作朋友，曾在涅瓦河畔与之倾心畅谈；他回忆往事，叙述自己的身世与感受；他在恰到好处的地方，暂时放下故事的进程，用抒情插话评论作品的人物、事件，发表一些关于人情世故、自由、创作等等的见解，描绘俄罗斯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开合自如，天衣无缝，作品情节似断而不断。普希金的这种抒情插话，汲取了拜伦的成功经验，克服了拜伦有时脱离情节的弊病；有更鲜明的民族内容，而无拜伦横扫欧洲的广度。互相对照的艺术手法也在作品中普遍使用。达吉雅娜爱上奥涅金，女方热烈，男方冷淡；连斯基钟情奥尔加，男方真诚，女方轻浮，形成对照。达吉雅娜写信给奥涅金求爱，受到训导；奥涅金写信给达吉雅娜求爱，遭到拒绝，前后形成对照。连斯基与奥涅金，一个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者，一个是冷漠的现实主义者，是“波浪和岩石，诗和散文，火和水”的对照。

别林斯基谈到《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没有《奥涅金》就不会有《当代英雄》，正如没有《奥涅金》和《智慧的痛苦》，果戈理就不会感到自己有充分准备对俄国现实作那么多深刻而忠实的描绘……”。

① 每行诗都有一定数目的音节，14行的音节是9898,9988,9889,88。它的押韵方式也是固定的。

除普希金外，十二月党诗人、特别是雷列耶夫的诗歌，克雷洛夫的寓言、格利鲍耶多夫的戏剧，莱蒙托夫、果戈理 40 年代以前的作品，都为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

二、19世纪中期文学

19世纪 40—60 年代这三十年间，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中先进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革命动力因而发生显著变化，革命性质也由贵族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变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50年代初，庞大俄国被小小土耳其打败，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英、法支持）战胜落后的农奴制度，引起国内矛盾激化，要求改革农奴制度的呼声出现新的高潮。1861 年，沙皇政府被迫颁发解放农奴的命令。60 年代末，民粹派继续反对农奴制，兴起了民粹派的革命宣传运动。

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已处于主潮地位，它继承并发展了以往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40—60 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品，灿若星辰，文艺批评也有了相当高的成就。创作为批评提供理论概括的依据，批评又反过来指导着创作，这种相互关系显得非常突出。同时，浪漫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或成为创作的重要构成因素，或在作品中独放光彩，也取得可喜成绩。

从 40 年代开始，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除与俄国解放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外，出现了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增强了批判性，所以又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奠基者，是果戈理^①。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在 30 年代写过一些很有份量的民间故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戏剧，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艺术构思独特、批判性极强的《狂人日记》和讽刺喜剧《钦差大臣》。40 年初写成的中篇小说《外套》，是继普希金《驿站长》

^① 一般认为，还有普希金。

之后，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一篇杰作。幽默和着眼泪，是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最能代表果戈理创作成就是他 1842 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钦差大臣》(1836)是世界名剧。它的核心情节是由普希金提供的。果戈理动用自己的生活积累，赋之以丰满血肉，提炼出深刻主题。他说：“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一下子把这一切嘲笑个够”。^① 剧中的偏僻城市就是俄国农奴制社会的缩影。这里，官僚们公开敲榨勒索，营私舞弊；市长利欲熏心，贪财如命；法官蠢笨似猪，玩忽职守；慈善医院恶臭难闻，病人满身污垢，“弄得象铁匠似的”；警察横行无忌，用皮鞭和警棍维持着秩序。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毫无民主与自由可言。

市长安东是果戈理精心塑造的反动官僚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俄罗斯官僚的恶行败德。他在下属和老百姓面前，有偏僻城市土皇帝目空一切的官气；在上司面前又是低三下四、溜须拍马的奴才。他混迹官场 30 年，练就了一整套看风使舵的看家本领，他自吹：“骗子里的骗子都上过我的当，想一手遮天的流氓和光棍都上过我的钩。我曾骗过三个省长。”他又是个极端贪财的家伙，一切巧取豪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肆无忌惮。大至整匹细呢，小至霉臭的李子干，全不放过。正因为他干尽坏事，做贼心虚，整座城市糟糕透顶，所以一听到钦差大臣奉旨视察的消息，他便惊恐万状，如芒刺在背，继而便采取应变对策。他打听到旅店来了个彼得堡官员，便以为是微服察访，把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大臣。塞去 400 卢布之后，又接到家中待为上宾。同时，为了掩盖劣政，叫街道统统插上草标，表示即将修整；组织人力对赫秘密监视，命令邮政局长私拆信件；要妻子女儿齐出动，撒出钓饵。赫列斯达可夫果然上钩，正当他向市长女儿求爱时，冷不防市长闯进门来，大叫：

^① 转引自斯捷潘诺夫：《果戈理的戏剧创作》，第 21 页。

“在接吻，真订婚了，嘿……大功告成了。”他进而想入非非，想依仗这个女婿的势力当上将军，还打算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叫所有这些爱上呈文递状子的家伙知道厉害。”

别林斯基指出，这不是“夸张了的现实”，也不是“滑稽闹剧”；他，“不是漫画”，“也决不是傻瓜”^①。

赫列斯达可夫是彼得堡的低等文官，花花公子，在衙门里被认为是废物。他来到这个偏僻城市时，因输得精光，“买东西什么都赊帐”。一听到市长大驾光临，竟吓得“面孔发白而且缩着身子”，怕被市长抓进监狱。不料市长误解了他愚蠢浅薄的言行，反倒吓得半死，且自我招供接受过贿赂。

吹牛撒谎，是赫列斯达可夫的一个特点。这位 12 等低级文官对市长说：“我每天进宫，明天就要升为元帅。我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象树叶子似的发抖。”他吃的西瓜，一个“值 700 卢布”，“锅里的汤是直接用轮船从巴黎运来的”。他撒下诸如此类的弥天大谎时，竟自把谎言当作真实，永远带着感情，沉醉在一片朦胧的诗意之中。

这个空有人躯的社会蛀虫，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他象例行公事一样，跪倒在市长女儿脚前求爱，当她母亲闯进来时，他立即来个侧转身，又跪倒在市长夫人的面前，“怀着烈焰似地爱情”求婚。

赫列斯达可夫与市长安东，是互为补充的两个典型形象。他们都是农奴制度本身生长出来的毒菌。果戈理通过这两个人物及剧本形象体系，深刻而集中地暴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反动性。赫尔岑指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密角落。”^②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358页。

② 转引自《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钦差大臣》表现出果戈理高超的艺术技巧。除人物刻划的典型性和具有讽刺特点、细节的真实性和贯穿全剧的总悬念而外，其艺术的独创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把戏剧性的误会用到了政治讽刺上，而且这种误会是有市长的特殊心理作为根据的，又与赫列斯达可夫的以假充真、以假为真相配合，自然而又富于喜剧性；其二，最具特色的收场——哑剧收场。当钦差大臣驾到的消息传来时，一个个惊得呆若木鸡，舞台上各摆各的姿式，没有一句台词，却胜过千万句台词。

《死魂灵》是果戈理的顶峰作品。高尔基认为，它在俄国文学上是“无与伦比的”。它的问世，震动了整个俄国。

这部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乞乞可夫。他是作品中唯一有传记的人物；他的性格是不断发展的。

作品不是一开头就由小到大写乞乞可夫，而是在他购买“死魂灵”的骗局暴露，逃之夭夭的时候，果戈理才提起他的思想基础和生活经历。他出身贵族，但门第不高。父亲把他送到城里上学时教了他两条：一是要讨好老师和上级，二是要把钱攒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两条成了他未来生活的信条。他在学校里巴结老师，虽无多少才能，毕业时却得了“敦品励学”的奖励；他在同学中搞投机，居然弄到了些钱。后来，他在省城谋到一个差事，进了税务局。听说科长家里有个待嫁的麻脸女儿，便把科长称为“爸爸”，对那麻脸姑娘亲热得同未婚妻一样。可是，当他靠科长之助，补缺当了科长后，便对他们弃如敝屣了。几经钻营换了两三个职务后，终于在他向往已久的海关谋到一份差事。由于侦缉走私有功，被加官晋级。他自以为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便与一个神通广大的走私集团相勾结，不久便弄到 40 万卢布。事情终于败露，他被抄了家，但他千方百计保留下了一万卢布，以图东山再起。他从一件代办抵押农庄的事务中得到启示，决心去买“死魂灵”。

“魂灵”，在俄语中有多种意义，如精神、心眼、灵魂、农奴、本质、要点、人口等。此处按宗教用语是“灵魂”，按实际生活是“农

奴”，乞乞科夫买死农奴是因为，农奴虽然死了，但在政府的花名册上还没有注销，在法律上还算活的，还可以是交易的对象。他如果买到一千个这样的死农奴，拿到救济局去抵押，每个农奴是两百卢布，就可以到手 20 万卢布。按当时法律规定，买卖或抵押农奴，必须连同土地。乞乞可夫没有那么多土地，便用移居赫尔生省荒地的名义，去搞到法律上有效的证明书。主意打定之后，便带着车夫和听差，坐上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马车上路了。

他的目的是到 ИИ 农村去买死农奴。可是事先他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在市里拜见官吏，以便为他的活动廓清道路。而通过乞乞可夫的拜见，果戈理既刻划了乞乞可夫逢迎谄媚的奴才相，又暴露了这批腐败官吏的丑恶嘴脸。

戈贝金是个爱国者，他在 1812 年的卫国战争中流了血，成了残废，可是却得不到沙皇政府的照顾。现实将他“逼上梁山”，他成了绿林好汉的首领。这个故事反映了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扩大并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当乞乞可夫用甜言蜜语取得知事、宪兵队长、警察局长以及来城里的农奴主玛尼洛夫、索巴凯维奇等人的好感后，他决定把他的拜访转向农村。五个农奴主，每人一个专章。果戈理说：“我的主角们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个比一个鄙俗。”^① 其中，玛尼洛夫精神空虚，生性懒惰；柯罗博奇卡愚昧而又顽固；诺兹德寥夫嗜赌成癖，喜欢吃喝玩乐、惹事生非；梭巴凯维支象条熊，粗野笨拙，狡诈贪婪，但他对 ИИ 市官吏的评判颇有道理。

泼留希金是最“鄙俗”的一个。他占有一千多农奴，是大农奴主，却过着叫花子一般的生活。他穿戴得不伦不类，连精明的乞乞可夫也很难辨出这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当他向乞乞可夫介绍“主人就是我呀”的时候，乞乞可夫惊奇得往后退了一步。他的相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象清癯的老年人一样，倒是他那身装

^① 转引自赫拉普钦科：《果戈理的〈死魂灵〉》，第 156 页。

束，非同寻常，“随便你用什么法子，花多大力气，也研究不出他的这件睡袍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袖管和衣襟乌黑发亮……背后原是两片下摆的地方飘挂着四片，棉絮成团地从那儿直往外钻。系在他脖颈上的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不知是袜子，还是吊袜带，还是肚兜，反正说什么也不是领带。”这种人，如果乞丐在教堂门口碰上他，准会施舍给他点什么，可是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叫花子，而是大农奴主。“哪一家也找不出象他样多的麦谷、面粉和仅是成垛地堆在田里的粮食，哪一家的储藏室、粮仓和栈房也没有堆积着那样多的布匹、呢料、硝过的和没有硝过的羊皮、晒干的鱼、各种各样的菜蔬或者瓜果菌蕈。”他的作坊大院，如果谁去瞧一眼，“准怀疑自己别是闯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而所有这些东西，都霉烂变坏，“禾垛变成真正的粪堆，只差在上面栽种白菜；地窖里面粉结成了石块，非得劈碎不可，不然就不能用；呢料、麻布和粗布简直碰都碰不得，一碰就会化成一团团的飞尘。”尽管如此，他田庄里的收入照旧不变，致使农奴大批死亡；他女儿两次回家，一丁点东西也没有得到。他越富有，越贪婪，越吝啬。人的感情在他身上“一分钟一分钟地枯竭下去”；千方百计地、毫无意义地聚敛财富，成了他唯一的生命需要！他偷农妇忘在井边的桶，凡在路上看见的：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颗铁钉，一角碎瓦，他都拾回家去，经他走过之后，道路都用不着打扫。“一个人，能够堕落到这样的无聊，猥琐，卑微里去的吗？”果戈理不由得发出了这句慨叹。

泼留希金的庄园也呈现出破败荒凉的景象。墙壁和门上长满了青苔，一大片房屋，看上去“好象一个跌倒的老弱残兵”，“没有开放的门户，没有往来的人，没有活泼的家景”。

泼留希金和他的庄园，也曾有过“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有条不紊”的时光，可是现在连人和他的庄园，都一齐衰朽了。这正好是农奴主阶级和农奴制度的象征。

农奴制度的衰落，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乞丐便是新兴资产阶级中代表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这个方面的冒险家典

型。①他的生活目的同泼留希金一样，都是为了发财，只不过性格气质、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客观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果戈理暴露、嘲笑俄国的痼疾，是为了引起沙皇统治者的注意，以便进行必要的社会改良；他无意推翻农奴制度。他用飞驰的三驾马车象征俄国的前途，但未来将会怎样，作者无法预料。

《死魂灵》的艺术技巧是很精湛的，特别是它情节结构上的独创性引人注目。购买死农奴的情节貌似荒诞，实际上并不荒诞，在世界文学中只有这一次，仅仅这一次。它把作品中的各个部分联结起来，或者说它带动了作品各有关部分的出现，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情节线，是让读者不断期待并从中获得艺术享受的戏剧性总悬念。在情节的开展过程中，果戈理成功地用上了拜伦、普希金在诗歌领域叙事时的抒情插话，使“带有生气的主观性优势，发展到高度的抒情的激情”②，这是结构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给后来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提供了范例。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就很明显地受到了它的影响。

果戈理的讽刺也很有特色。它不是通常用的夸张手法，而是集中用小事以显奇效的方法进行辛辣讽刺，“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示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泼留希金那样富有，却偷水桶，拣钉子；墨水瓶里装着一种起了白花的液体，浮着许多苍蝇；掏出甜酒里的小虫子和脏东西，用以敬客，都是例子。这种讽刺，比漫画式的夸张的讽刺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1846年，果戈理在侨居国外期间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集》，向沙皇忏悔。别林斯基等进步人士对他进行了批评。

40年代，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理论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别林斯基(1811—1848)是19世纪俄国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

① 请注意列宁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评价。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②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415页。